

みんなの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Discourses on Family, Ethnicity, and State in China :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by East Asian Anthropologists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4-12-12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韓, 敏
	メールアドレス:
URL	所属:
	https://doi.org/10.15021/00002349

中国社会的家族・民族・国家的话语及其动态 ——东亚人类学者的理论探索

Discourses on Family, Ethnicity, and State in Chin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by East Asian Anthropologists

韩 敏
HAN Min

This book is to unite scholars from Japan, China, and Korea in 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ject to explore the dynamics of change in concepts of family, ethnicity, and the nation-state in China since the bir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socialist governmental regime.

In China, concepts of household, family, ethnicity, nation, and state function as frameworks for generating complex social relationships. Additionally, these have been important elements of both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in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Some of the concepts are indigenous, molded 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 Others have been import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in China. As China has changed from empire to republic and then to a socialist state, as well as from a primarily agricultural to an industrializing and urbanizing society, the concepts mentioned above have been construed by multiple social actors responding to diverse circumstances. In recent years, these concepts and the related systems have been reconstructed as discourses regulating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patterns of behavior in the various contexts of development, welfare, migration, tourism, and cultural heritage.

We have two aims for this book. One is to review and explor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bout the concepts and dynamics of family, ethnicity, and state. Another is to concentrate on the issues of ethnicity, *minzu*, *zuqun*, and investigate the formation and functioning of ethnic dis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urbanization,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by case studies.

1. 序文
2. 社会与文化的延续与变迁的机制—话语
 - 2.1 中国的家族・民族・国家的话语
 - 2.2 近现代中国的两个驱动力—近代革命和全球化
 - 2.3 民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基于交流协议的学术合作

- 2.4 作为研究框架的话语分析
- 3. 作为研究框架的家族・民族・国家・生与熟
- 4. 族群的话语与文化遗产
- 5. 历史视野下的民族与文化构建
- 6. 结论

1. 序文

本书是2012年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以下简称民博）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中国的社会与民族—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及实例研究」的论文集。这次会议是民博的机关研究「中国的家族・民族・国家的话语 **Generation and Dynamism of Discourses on Family, Ethnicity and State in China**」（代表：韩敏2012. 4 -2015. 3）起步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学术成果发表会。本次会议于2012年11月24日至25日在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内召开，两天期间94名来自日本、中国和韩国的学者参加了会议。末成道男、翁乃群、金光亿、周星、色音、张继焦、河合洋尚、吴凤玲、宫胁千絵、今中崇文、李海燕等11名来自韩国、中国和日本的东亚学者做了精彩的发言。渡边欣雄、佐々木史郎、塚田诚之、横山广子、田村克己、聂莉莉、瀬川昌久、小長谷有紀、秦兆雄、田村和彦、川口幸大、刘正爱、泽井充生等东亚学者等参加了大会，并做了评论（参照附录、照片1）。

本次会议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探讨有关家族、民族、国家的话语及其动态的人类学理论框架。中国是一个文明历史悠久、政权不断交替而其结构又是相对稳定的社会。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人类学者在研究文化的制度、结构和功能的同时，也应注重研究其文化的生成、延续和变容的过程。因此，解释文化的结构和动态的有效框架一直是人类学者不断追求的目标。家族、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尤其在中国，家、族、民族、国、国家等概念和话语形成了基本的社会关系，并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各种社会实践。它们是贯穿中国历史，形成文化的连续性和断



照片1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2楼第4会议室 2012年11月25日

裂的重要因素。像家、族、国、邦、生熟、华夷、天下等是中国人在漫长的农耕社会的文明中自生的概念和制度。而像民族、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是近代从日本、苏联、欧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外部社会导入中国，并在中国形成了一套话语和制度。中国从王朝体制到共和制、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在农耕社会向工业化、情报化社会的转型中，上述的概念被複数的主体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转变成各种言说。尤其是在如今的全球化的影响下，这些概念在发展、文化的保存·保护、福利、旅游开发等文脉下，被不同的主体变成不同的话语，影响并制约着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的行为方式（韩 2012a：8～9）。因此，笔者认为，对家族、民族和国家的话语分析有可能为我们揭示中国的结构和动态提供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本次国际研讨会的第二个目的是基于上述的问题意识，通过日、中、韩东亚人类学者的对话，以民族为焦点来探讨在近代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建构以及全球化过程中族群和民族的话语在日常生活、信仰、历史记忆、文化遗产、移动、城市开发、企业经营等方面的展现和实践。

2. 社会与文化的延续与变迁的机制—话语

作为本次国际研讨会的策划人，笔者首先从以下三方面阐述一下本次研讨会的理论背景和策划成形的过程。

2.1 中国的家族·民族·国家的话语

首先，这次会议是民博的机关研究之一「中国的家族·民族·国家的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主持的机关研究「中国的家族·民族·国家的话语」于2012年4月启动。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日本、中国、韩国、美国等人类学者的共同研究，对近代中国的家族·民族·国家的概念和动态进行比较研究。民博的机关研究是民博的重点研究，是一种联合日本海内外的学者和研究机构进行的共同研究的形式，始于2009年秋。正如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长须藤健一教授在开幕词中表述的那样，民博作为日本的大学共同利用机构，国际共同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民博机关研究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本次国际研讨会的召开是一次非常可贵的尝试。

2.2 近现代中国的两个驱动力—近代革命和全球化

本次国际研讨会也是在民博的两个共同研究「中国的社会变化与再構築—以革命的实践与表象为核心」（代表：韩敏2004-2006年）和「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再構築—从全球本土化的视野来看」（代表：韩敏2008-2011）的基础上的一次理论升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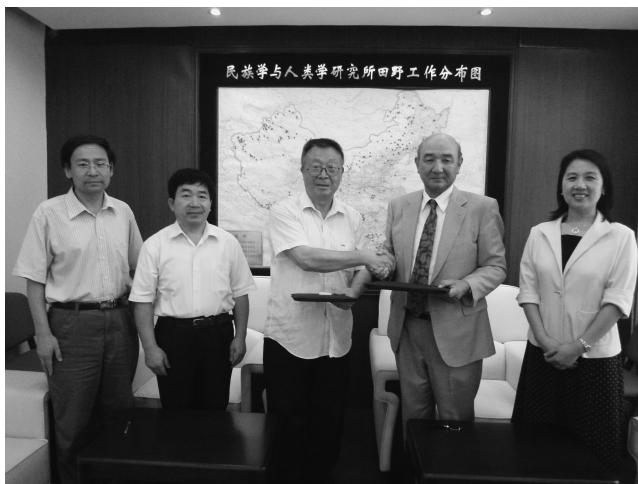
笔者认为，形成现代中国的驱动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整个贯穿20世纪的争取民族、社会和经济平等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个原动力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原理的全球化。在第一个共同研究里，我们把20世纪的辛亥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既看做是一种近代化的形式，同时也把这两次近代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制度看做是一种综合的文化体系。笔者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理念生成了新话语和制度，同时以服饰、礼仪等形式被表象着，并被人们实践着。新制度和话语

与传统之间有断裂，也有延续。在市场经济及全球化的现在，革命的话语、记忆、诸制度被不断地重构。在第一个共同研究「中国的社会变化与再構築—以革命的实践与表象为核心」(2004-2006年)的过程中，我们通过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问卷调查、文本分析、个人生活史等方法，从(1)宣传、话语、服饰、电影中的革命表象；(2)革命过程中民间的社会制度、文化及礼仪的重构；(3)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下的革命记忆与社会转型的三个角度分析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表象和实践，为中国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三个崭新主题和框架(韩 2009)。

在第二个共同研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再構築—从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视野来看」(2008-2011年)里，我们俯瞰了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均质化以及以此引起的本土化和多样化的现象，分析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中国化·民族化·地域化·个人化等不同层面的本土化过程，并考察了在全球化的竞技场上，地域的、民族的、中国的価値及文化认同被重新构筑的状况以及缘由¹⁾(韩敏 2010, 2011)。

2.3 民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基于交流协议的学术合作

本次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也是为了继续加强以民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为主的日中人类学的学术交流。2011年11月我们曾在民博召开了一次小型国际研讨会「全球本土化中的文化传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的色音、张继焦、刘正爱和舒瑜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中日双方以中国的民间信仰、芸能、中华老字号的传承为焦点，从国家、地域、市场以及文化的实践者的角度，探讨了文化的传承以及变容的形態以及其机制(Han 2012)。这次研讨会的召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与民博的学术交流奠定了基础。为了更进一步地发展双边的学术交流，一年后的2012年8月28日，须藤健一馆长与笔者访问了中国社会



照片2 2012年8月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北京社科院民族所签订学术交流协议。(左起 色音、王延中、张昌东、须藤健一、韩敏)

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并与该所正式签订了双边学术交流协议（照片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次会议也是民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建立了学术交流协议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国际研讨会。

通过上述两个日本国内的共同研究以及一次小型的国际研讨会，我们发现1家族、民族和国家贯穿近代中国历史，是构成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主要元素。2在近代的中國革命以及全球化本土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断裂和延续。3社会·文化的断裂和延续都伴随着话语的改变；而断裂比起延续则更多地伴随着话语的改变。因此，为了更深入地考察中国社会·文化的断裂和延续的机制，笔者组织了新一轮机关研究「中国的家族·民族·国家的话语」（代表：韩敏2012.4-2015.3），在这个课题里，我们把家族、民族和国家的「话语」看做是产生中国社会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装置（韩2012:8-9）。

2.4 作为研究框架的话语分析

话语（discourse）一般是指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它来源于希腊语的logos，是经过概念的作用和理论判断、有秩序的语言表现。话语同时也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和人之间进行沟通的具体语言行为，它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话语一词最初是语言学的概念，因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语词与事物》和《知识的考古学》的影响，被广泛应用于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语境下被译成话语，在日本通常被译成言说。

如上所述，话语是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因此它具有社会性。话语分析就是指研究人们说什么、如何说以及所说的话带来的社会效果。因此，话语不单单是语言表达，它与规制人的身体和行为的制度、权力密切相关，反映现实，规制现实同时也可以生成新的事实和历史。福柯认为人类的历史样态是话语构建的客体，而不是人经过理性的、自由选择的结果（福柯1970, 1974）。

就近代而言，近代的基本话语形式是知识（savior）话语。正是这些“近代知识形成了真理以及判断真理的标准的真理生产体系。通过这些话语和制度，权力使人主体化的同时，也使人从属化（関2002:120）”。

话语是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因此人类学也会把话语放在制度的权力或权威论的文脉里来探讨。本论文集试图在援用上述有关话语的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和近代国家形成中家族、民族、国家的话语分析，来揭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动态。长时期以来，家族、族群以及国家的话语以不同的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个层次以及每个民众。它们不仅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时这些话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形成了不同的制度、政策、对策和文化特征，并可以转化为新的实践和现实。例如，近代中国的“民族”话语把在地方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主体性认同意义的族群或移民纳入近代国家的体制下，并产生了“民族”的历史、服饰及认同等。此外，民间的传说、学界的学说也可以在一定的背景下形成话语，并通过各种媒介应用在博物馆、旅游、城市开发、商业行为等场面中，产生各种经济、社会或政治效益。

近年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实施的文化遗产制度给中国以及东亚地区以极大影响，中国政府迅速根据国际的文化遗产动向，采取了新的文化战略，在中国建立了县、市、省和国家级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认定和管理制度。通过文化遗产的认定，政府将各种文化形态纳入国家政权的文化框架管理之下，并用新的话语来诠释这些文化的形态和价值。例如，文化遗产制度以及文化遗产话语在现代中国的实施可能会产生使某些流动的、复合的、或原本属于多阶层、多地区、多民族的文化现象产生固化或分割化等现象。

基于上述的思考和问题意识，本书的14名东亚人类学和历史学者对家族·民族·国家·生与熟的近代话语和框架、国家框架下的文化遗产及其资源化以及历史视野下的民族与文化构建这三个命题展开了讨论。这三个命题构成了本书的三个部分。

3. 作为研究框架的家族·民族·国家·生与熟

本书的第一部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通过对人际或族群的生与熟的分类、东亚家族的四种理论模式、国家话语中的民族与地方社会话语中的族群、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探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概念—家族、民族、国家的特征和形成机理，并通过对日韩中、欧美及前苏联在近代的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及人类学的比较研究，揭示了诠释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与共性的理论框架。

家族是人类学的重要课题，也是东亚人类学积累最多的部分。在东亚的汉字文化圈里，日本、中国、韩国和越南都使用家这个汉字，但每个社会却因其社会结构、宗教、近代化过程等政治和经济等原因，赋予家以不同的功能和形态。虽然，在1980年代曾有过像日本学者中根千枝教授曾经做过的对亚洲家族的结构比较研究（中根 1981，1987），不过基于长期田野调查的东亚家族比较研究却十分罕见。末成道男以其在日本、韩国、越南、台湾、中国大陆的近50年的田野调查经验为依据，以血缘（社会组织、祖先等）、儒礼遵守程度、场的原理（家屋等）这三个要素为主，比较了东亚的汉人社会的家、韩国的家、越南京族的家和日本大和族的家，并提出了「中华模式」和「周边模式」的两种理论框架。同时还以儒教、佛教、高度经济成长时期等因素为公分母，比较了东亚家族近代化的过程。这种基于血缘、地缘、宗教、高速经济成长的比较研究和理论框架的构建不仅对于东亚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对东亚以外的社会研究也具有普泛的适用性。

地处欧亚大陆的东端、面向太平洋的中国，自古以来就在多民族的移动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多民族的复合社会，并且出现了「民」、「族类」、「蛮」、「夷」、「戎」、「狄」、「种人」、「华」、「夷」等分类和概念。在帝国体制的中国，国家的统治是建立在以华夷秩序的基础之上的。以汉字为媒介的礼教被称为文或文化，并构成了华的世界的核心。而这些文化尚未波及的地方便是夷的世界。「夷」可以通过文化编入“华”的世界，作为“文化国家”的中国就是通过这个文化的渗透过程不断地扩大，并维持其统治的」（横山 1997:177）。

19世纪以后，西欧的「民族」随着民族国家模式在世界的影响经由日本而传入中国。20世纪50年代又因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构建，经由苏联斯大林的模式再次导入中国，并在政府决策和社会实践的层面上展开了至上而下的民族识别。众所周知20世纪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

「民族」政策参照了1913年苏联斯大林的理论定义以及1926年和1927年在苏联实施的人口调查和民族识别。而实际上，如果更进一步地追溯苏联的民族理论的系谱的话，可以在欧洲的民族国家（national-state）的模式中找到它的源头。也就是说，斯大林所做的民族定义是参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欧洲的民族状况之后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正是在构建国民国家的框架下，创建了民族。

翁乃群在本书中指出在中国，“族群”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族群”包括国家语境下的“民族”，也包括地方语境下的具有主体性认同意义的社会文化共同体。狭义的“族群”是指在地方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主体性认同意义的文化共同体。而“民族”是国家语境下，结合“族群”分类体系下识别认定的社会文化再次归类构建的，被赋予政治性意义的社会文化共同体。中国大陆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界关于“族群认同”的研究只限于国家语境下的“民族认同”研究。而实际上，除了在国家语境下的56个民族认同实践之外，在中国还存在着大量的、从未间断的以地方语境为主要背景的“族群认同”实践。例如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纳日人，他们在云南被认定为纳西族，而在四川的纳日人精英则根据历史认为自己是蒙古人。国家语境下的“民族认同”与地方语境下的“族群认同”既有区别又交互作用。翁认为通过这样的探讨将加深人们对族群认同在中国的国家和地方语境下的实践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的理解，达到对其普遍性意义的认识。

此外，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是本次国际研讨会的主题之一。

来自韩国的中国人类学者金光亿指出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性的欧美理论通常是以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为前提的，通常把所谓 folk、民众、大众、农民看作是与国家对立的领域，把两者间的紧张和矛盾视为历史的原动力。而从中国的研究结果来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多的是以两者的共谋（conspiracy）、竞合（co-opetition）以及妥协（compromise）等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往往把传统认定为是农民的，并且把分析的焦点放在国家对它的评价和干涉上。祖先崇拜以及修谱等宗族复兴活动看上去好像是与政府相对峙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活动，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国家把宗族作为吸引海外华侨资本的一种有效的制度、构建中国与海外华侨网络的手段以及确保中华文明主导权的文化资本。而民众则把宗族复兴作为确保他们自己空间的一种战略，通过与国家共有所谓中华文明与文化遗产等概念，以此来跨越由国家规定、管理和监督的现实世界的界限，构建他们自己的想象共同体。

其实，国家和民间社会的共谋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族和民间信仰的兴起在历史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近年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华南宗族比北方发达的原因并非弗里德曼所说的是来自边陲社会治安的不稳定所产生的自我防御的必要性，而是王朝国家和地方社会把宗族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的共谋结果（Faure 2007）。有的学者认为，华南宗族是明代民间利用国家话语的大规模的文化创造（张 2013）。福建民间这种利用国家话语进行文化创造和再生的传统在现在的福建宗亲会的成立及其运营中仍可以看到（陈 2012）。因此，人类学应该更多地关注构成社会的不同部分是如何对立、调整、妥协和共谋的。而在这个研究过程中，话语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揭示社会动态的机制和文化逻辑。

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家族、民族和国家话语的时候，自然不可忽视“个人”的存在。费孝通的

“差序格局”理论为我们认识中国的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框架。因为它揭示了汉人社会及文化里以个人为本位由近及远的结构和文化逻辑。对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成长的、移动的人、具有多重社会关系的人来说，他是如何认识和运作他的文化逻辑？周围的人群又是如何看他的呢？

周星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生食”、“熟食”的分类入手，并从个体和周围的双向角度，对汉人社会及文化里以个人为本位由近及远的“生/熟”的话语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中国人社会关系的文化逻辑。他指出对人的“生/熟”分类及其话语在汉人社会及文化中具有的重要和广泛的适用性，在乡土熟人社会和现代都市社会均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此外，它和现代公共性也有抵触及冲突。周星的汉人社会的“生/熟”研究和“差序格局”理论所描述的结构相互衔接，从另一个角度对费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理论做了一个补充。因此，可以说人的“生/熟”的分类和话语分析是揭示汉人社会及文化里以个人为本位由近及远的结构和文化逻辑的有效框架。

4. 族群的话语与文化传承

如果说本书的第一部，重点在于探讨中国社会中的家族·民族·国家·生与熟的理论框架，那么，第二部则是把焦点放在族群的话语及其对文化传承产生的影响上。

在这里，我们首先分析了族群和民族话语的内容、产生过程、生成的主体，同时大家也注意到了这些话语转化为构建族群认同、旅游开发、建筑、服饰等文化资源的过程。

以中国的“民族服饰”为例，中国的“民族服饰”一方面表达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一体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少数民族内部的多样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族服饰”越来越成为一种资源，并且以保护、发展为目的，被应用在各种旅游开发、展览会以及摄影集中。在苗族“民族服饰”的国家话语以及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苗族服饰文化的悠久历史以及蕴含在制作技法和图样中的民族思想被反复地强调着。宫胁千绘在云南文山县考察了蒙支系苗族的村落、服饰工厂、定期集市以及销售者之后发现，国家话语中的“民族服饰”和当地人的想法有出入。在当地已经不存在传统服饰的制作，人们爱穿设计和用色新颖的服饰。与在国家话语中产生出来的“民族服饰”不同，蒙支系苗族在实践中创制了，并穿戴着他们自己的民族服饰—不断变化的日常着装，而不是民族文化资源的“民族服饰”。

族群话语不仅可以构建，还可以超越空间产生影响。在中国，学术话语一旦被导入行政和经济框架里，就会在更广的范围里产生更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学术话语可以借助学术权威、权力和金钱的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如使日常生活的固化等现象。而且同一话语在不同的空间或群体会产生不同的反映，产生不同的社会或经济效益。

例如，塚田诚之的论文考察了有关贵州屯堡人的研究史、学者们有关屯堡的不同解释话语之后，指出600年前明初江南屯军后裔的说法被固化，并在旅游开发中被夸大地展开。贵州的屯堡话语在旅游开发中的应用为我们揭示了学者的学术话语与政府和旅游开发部门结合后，对旅游以及旅游地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河合洋尚也通过对四川成都和广西玉林的两个不同类型的客家地区的比较证明,“客家话语”在不同的客家地区普及时产生了不同的回应。在成都,地方政府和学者推行了客家文化政策,并产生了当地客家的认同感。其建构的客家文化比较符合在全球范围内普及的相关话语(如“客家火龙节”体现了客家原乡地的文化及团结精神)。而在广西的玉林,在开发商、旅游公司、商人和宗族的推动下,大部分玉林居民产生了客家认同,但其客家认同较多来自适合当地原有文化的客家话语。在玉林,客家话语已经成为追求区域经济和民族秩序的实践主体利用的资源。

此外,我们也发现同一话语主体也会在不同阶段,根据新的需要而该变其话语。东北辽宁的民间信仰—烧香还愿仪式以及达斡尔族的斡米南仪式就是很好的实例。这两种传统仪式经历了从迷信到文化遗产的国家话语的转变。刘正爱指出,国家精英话语经常用“迷信”或“淫祀”来描述民间信仰,并将烧香还愿仪式定位成原始的、落后的、低级的宗教形态。而对于民众来说,这是一套与家族、村落、区域文化等密切相关的信仰体系。她指出以神明世界为核心的象征秩序是现实秩序的一个补充。民众的日常生活正是在这两种秩序当中得以持续的。80年代以后,学者们大多通过“烧香”的音乐和舞蹈形式,或者将其归类于萨满教而试图获得某种话语权。吴凤玲指出在国家的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工程的推动下,官方抛弃了以往将萨满教视为封建迷信的做法,将其视为民族文化遗产,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对萨满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和认识。同时地方政府也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文化发展和经济繁荣的需求出发,从斡米南仪式里看到了萨满文化的多民族性、伦理性、国际性、文化旅游的价值,把它作为一种财富和资源加以保护和开发。例如:政府为了弘扬达斡尔族的萨满文化,扩大其在国内和国际的影响,申请并承办了国内和国际的萨满学研究会议。其次,以巨资修建萨满文化博物馆,展现包括达斡族在内的8个少数民族的萨满文化。国际萨满学会主席霍帕尔和副主席白庚胜对莫旗的萨满文化保护和研究工作予以肯定,并推荐将萨满文化博物馆列入“世界吉尼斯”之最。自2007年开始,政府还通过塑造以敖包节为代表的民族节庆品牌来发展旅游业。每年6月28日的莫旗敖包节原本是宗教意义浓厚的节日,近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城乡民众对敖包节都表现出了很高的参与热情。萨满师傅也在敖包节上受邀主持敖包祭祀。在莫旗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在展示莫旗风采的花车巡游中也可以看到萨满击鼓的身影。政府的这些举措无疑以官方的话语权为萨满文化信仰的传承和保护赋予了极大的合法性存在空间。

通过本次国际研讨会,我们也更清楚地看到了话语,尤其是强势话语的产生或变化所带的新的文化现象、社会事实以及种种问题。例如,蒙古族的民族圣地成吉思汗陵成为被东联集团开发成文化旅游景点后,为成吉思汗守陵金800年的蒙古族部落达尔扈特人经常向游客表演祭祀仪式,并在与游客的不断接触中提高了“文化自觉”的意识,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同时满足了部分游客的深度旅游体验的需求。同时,频繁的仪式表演也使具有严格的礼仪禁忌、神圣性、民族性的祭祀民俗日常化、表演化。祭祀的旅游化也给旅游地带来了不按民族宗教习俗办事,把一些少数民族不愿意展示的文化要素商业化等负面影响。

除了上述的文化商业化的问题之外,我们还探讨了文化遗产制度化之后所产生的某种文化被分离等现象和问题。例如,“丹东单鼓”和“岫岩单鼓”原本是扎根在东北民间信仰中的生活实

践的一部分。2006年6月,被列入辽宁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单鼓”便从整个系统的生活实践——“烧香”中剥离出来的,而非作为一种祭祀仪式的宗教实践。在“烧香”这一民间实践中,其音乐和舞蹈部分被国家话语分为表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其司祭、香主、烧香内容、祭祀仪式等仍然被表述为“迷信”。

5. 历史视野下的民族与文化构建

本书的第三部从越境移民、百年中药业在20世纪被纳入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管理框架的过程、以及历史事件在国家正史、地方历史和民间话语中如何被不同的主体表述的机制。

张继焦从企业人类学的角度,把人际关系作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1994),并用人际关系的两种模式: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强关系和普遍主义的人际关系——弱关系,分析了两个著名的中药老店鹤年堂(明·永乐3年、1405年创建)和同仁堂(清·康熙8年、1669年创建)在近代社会主义国有化的过程以及市场经济民营化的过程中企业和国家的共谋、庇护等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给两个老字号带来的不同命运。中华“老字号”企业不仅是一种商贸景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传统文化现象。1950年代,在实施公私合营之后,中国的老字号企业曾经都属于国有企业。而这一现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产权不明、管理滞后、管理成本过高等“国企老毛病”。不过,同仁堂在受到中央及北京政府的庇护下,逐渐成长国内外知名的医药企业,成为中国“老字号”医药行业中的顶峰,“同仁堂”这三个字也成了家喻户晓的中药的代名词。而曾在1920-1930年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医药企业的鹤年堂在多次的公私合营、企业改制过程中,由于没有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足够的庇护,则逐渐萎缩成一个连北京市级的知名品牌都算不上的企业。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产权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同仁堂在大陆和香港分别上市之后,同仁堂的民营化对中央和北京市政府行为形成明显的制度约束,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再扮演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企业家”角色,从“庇护人”变成了“信托人”,退出了企业,转为从外部间接地推动同仁堂的发展。相对之下,政府对鹤年堂的“庇护”越来越少,更不可能成为鹤年堂的“信托人”,鹤年堂的经营多靠“自谋生路”。通过两个老字号不同命运的比较,张继焦指出:老字号作为一种实体企业的发展方式是多元混合的。在同仁堂的经营中国家资本主义处于主导地位,但其自由资本主义的色彩也很明显;此外,还有保留部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份。而鹤年堂尽管自由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但还有保留着一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份,并也带有一点国家资本主义的色彩。

今中崇文的论文分析了中国国内规模较大的回族聚居地之一的西安回坊。西安回坊继承了清末西北回民起义所规定的空间范围,随着新教派的传来和移民的流入,回坊社会开始扩大,出现多层次化。除了清末的一段时期外,西安回坊并没有成为一个能够发挥机能的独立体。2000年以后,当地的回民企业家等在回坊的四周设置了几处清真门楼,使回坊与周边区域的界线可视化。清真门楼的设置一方面避免了回坊成为城市改造的对象,同时也重新构筑了人们对回坊是回族聚居地的认知,让人们意识到回坊才是适合穆斯林生活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子女的教育和职业

等因素，有些回族离开回坊。清真寺礼拜的人逐渐减少，人们似乎将人生分为追求物质生活和追求信仰的两个阶段，退休以后开始追求信仰的观念普遍可见。

李海燕的论文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朝鲜民族的形成关系。她指出，朝鲜族是19世纪中叶从朝鲜半岛移民到中国大陆，在朝鲜半岛有其民族和文化的根基，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群。这个民族的形成是东亚近代国民国家形成的产物。日本战败后，中国东北地区社会秩序混乱，一部分东北地区的朝鲜人返回朝鲜。对留下来的朝鲜人，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土改，给他们分了土地，积极推行民族团结政策。之后，从国家层次明确了东北地区朝鲜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在朝鲜人集中居住的延边施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朝鲜族的诞生时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以及东亚近代的国民国家的形成时机基本相同。朝鲜族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国家的民族构建过程中产生的，是由国家主导实现的。

田村和彦的论文「从生活话语来看“历史”记忆——以陕西同治回民起义为例」以当地人的口承故事为资料，对同治年间发生于陕西关中地区的回民起义的话语进行了分析。田村根据叙事(narrative)模式——在民族国家或世界范围通用的制度模式、在村落或近邻通用的集体模式和个人模式(Portelli:1991)，对当地居民有关回民起义的口承故事和生活话语的角度作以再定位。他指出，无论是以封建社会的忠节为基轴的历史重构——从破坏当地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还是今天的地方志体现出来的从宏观的民族对立的视角定位回民起义，都与今天当地居民的口头传承中显示的对这一事件的定位有所不同。每个事例都含有各自的变形，在个人模式和集体性模式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叙述。

陕西关中地区回民起义的话语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反思话语与文字化的历史和权力关系的契机。在不同时代的各种势力较量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通过文字化这一特殊的过程，总体的现实的一部分作为事实被记录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虽然史料是经过严谨考察的，可是成为史料的材料是在某种意图下被文字化的东西、或者是偶发性的记录，在其背后通常都有着大量的“失语”的现实状况没有被提及。田村指出：我们需要继续保持与历史学的对话，但是人类学不仅仅是补充没有文字史料的领域，还要从当地人的历史记忆及其内涵来分析过去的现象。无须赘言，其记忆也与文献史料一样，受过个人的选择，没有保留完整的体系。但是这些人们生活世界中的历史记忆并非分散的历史片段，它们在人们整理、解释自己的生活世界的过程中不断被叙述，并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方式赋予了意义和逻辑。

6. 结论

2012年11月24、25日在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召开的「中国的社会与民族—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及实例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东亚的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大家围绕着近代中国的家族、民族和国家的话语及文化动态进行了真诚的讨论。本次国际共同研究的学术意义和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通过本次会议的探讨，在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中，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的有效性和重要

性再次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是民族独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形成的世纪,同时也是新兴的民族国家的权力向社会渗透的世纪。在国家权力对社会渗透这一点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尤其突出。民族国家的形成包括民族国家的创建(nation-building)和国家政權建設(state-making)的两个过程(Tilly 1975)。民族形成是指国民意识和归属意识,包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参与、義務及忠诚等方面。国家政權的建设是指国家权力的扩大、政權的官僚化、浸透性。本书通过东亚学者丰富的田野实例,揭示了国家权力的渗透通过多种渠道,包括企业(张继焦)、家族、信仰(刘正爱、吴凤玲)、民族框架的设立与管理(翁乃群、今中崇文、李海燕)、服饰(宫胁千绘)等等。同时国家权力的渗透也伴随着国家话语向社会的渗透。这些成果为研究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多种切入点。

此外,通过探讨我们发现,即使是对同一种文化现象,从国家层面发出的话语也会随着时代的需要、市场经济、全球化等影响做出不同的调整。这点在“民間信仰”中的巫术(刘正爱、吴凤玲)方面体现得比较明显。“民間信仰”中的巫术在建国后到20世纪80年代,在社会主义进化论的语境下是被作为封建、落后、迷信、糟粕而予以排斥的。而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旅游业、文化产业的崛起,民间信仰又被另一种尺度加以衡量。那些被视为有消费价值的成分被说成是民族、地方的文化而在旅游、城市开发等场面加以宣扬;而那些所谓封建、落后、迷信、糟粕的成分需要剔除之后才能被列入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

即使是同一时代的国家话语在不同地区也会出现不同的表述。在靠近台湾的沿海地区或侨乡,包括祖坟、祠堂、族谱、祭祖仪式等宗族活动被政府和当地人都看作是有形成跨越国家领域的华侨网络的潜在可能性,因此,政府对沿海地区侨乡宗族的态度比对其他地区的宗族则更开放一些,甚至出现政府与宗族的共谋的现象(金光亿)。福建沿海地区的妈祖比其他女神受到国家话语青睐的原因也在于妈祖的信仰群体跨越了国境,具有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以及海外华人联谊的潜在亲和力。在文明历史悠久、政權比较稳定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形成了多重的复杂关系,两者的关系是互动的,有对立,也有共谋(conspiracy)、竞合(co-opetition)以及妥协(compromise)的形式表现出来。

话语不是中立的言语,通过考察族群及其文化遗产话语的内容、产生过程、生成族群话语的主体,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话语如何转化为构建族群认同、旅游开发、建筑、服饰等文化资源的过程。也就是说话语具有建构族群认同、产生新的文化现象、或使某种综合的文化现象分割化(刘正爱)、使某种局部的文化现象扩大化(河合)、固化(塚田)等功能。话语不仅可以构建,还可以超越空间产生影响。而且同一话语在不同的空间或群体会产生不同的反映,产生不同的社会或经济效益(塚田、色音、河合)。在全球化时代,话语已成为重新建构家族、族群、国家文化的资源和动力之一。

此外,人的生与熟作为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框架的讨论也是本次会议的收获之一。从列维-斯特劳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生食/熟食”这一学术命题引申出的中国汉人社会及文化中“生”与“熟”这一对民俗分类范畴揭示了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汉文化,将“生/熟”这一组二元对立的范畴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人的生与熟分类逻辑的人类学研究将为我们揭示本土的汉人社会

以及海外的华人社会的文化逻辑提供一个框架。

通过东亚人类学者的学术交流以及本论文集的编辑可以发现，虽然东亚各国有着不同的社会体制，经历了不同的近代化过程，从漫长的历史来看，处在同一汉字、儒教文化圈的东亚人类学者在研究对象、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例如，与西方学者相比，东亚的学者似乎更注重深入到民众中的田野调查，与当地人同吃同喝同住同聊天。此外，对历史方法的重视也是东亚人类学者的共性。这些都是我们今后进行更多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从20世纪初以来，东亚的人类学界在与欧美的接触中逐渐成长起来。各国的人类学者都分别与欧美有着极强的联系。而东亚学者之间的连带一直是大家期盼并有待加强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次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和论文集的出版仅仅是一个尝试，希望我们的努力对东亚民族学人类学界的相互了解和学术交流，为与亚洲以及包括欧美的世界人类学的对话以及人类学理论和发展做出有意义的尝试。

【附录】

「国际研讨会 中国的社会与民族——人类学的框架与事例研究」

Chinese Society and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Frameworks and Case Studies

2012年11月24日、25日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第4会议室

日语、中文（同声传译）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主办、日本文化人类学会后援

11月24日（土）

13:30~14:00

须藤健一馆长致开幕辞

韩敏 宗旨说明「家族・民族・国家的话语——人类学的框架与个案研究」

第1分科会 主持 塚田城之

14:00~14:40 「中华汉族的家族与家——从东亚的人类学调查出发」末成道男

14:40~15:20 「从国家和地方的语境来看民族和族群的认同——以藏彝走廊为例

翁 乃群

15:40~16:20 「国家与社会——中国研究的理论框架」金光亿

16:50~17:20 评论 佐佐木史郎、聶莉莉、渡边欣雄

11月25日（日）

第2分科会 主持 横山广子

10:00~10:30 「“生”、“熟”及其中间——中国的人际关系の构筑」周星

10:30~11:00 「试论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以成吉思汗祭奠为例」色音

11:00~11:30 「族群的言说与社会空间——中国广西与四川的客家空间的生产」河合洋尚

评论 濑川昌久、小長谷有紀、秦兆雄

第3分科会 主持 佐佐木史郎

13:00~13:30 「中华从中华老字号看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对两家“老字号”企业（鹤年堂、同仁堂）の个案研究」张继焦

13:30~14:00 「苗族的民族服饰与文化认同」宫胁千絵

评论 川口幸大、田村克己

第4分科会 主持 河合洋尚

14:40~15:10 「达斡尔族萨满文化传统的当代变迁——以斡米南仪式为例」吴凤玲

15:10~15:40 「城市少数民族集住地の再构筑——以陕西省西安市的回坊为例」今中崇文

15:40~16:10 「从国家、社会和族群来看中国朝鲜族的形成（1945-1960）」李海燕

评论 刘正爱、田村和彦、泽井充生

17:10~18:00

综合讨论 主持 韩 敏

色音、金光亿、濑川昌久

参考文献

（中文）

张小军

- 2013 「文治复兴与宋代以后福建民间信仰的国家化」,『中日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创新与田野调查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pp.141-148。

（日文）

陳夏哈

- 2012 「1949年以前の同姓団体の生成と現在の再興——福建省南部の事例研究」『総研大文化科学研究 第8号』総合研究大学院大学 文化科学研究科（日本）。

韓敏

- 2009 『革命の实践と表象—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革命的实践与表象——现代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東京：風響社。
- 2010 「中国のグローカル化の人類学的研究」、『民博通信』129：18-19。
- 2011 「グローカル化の中の中国社会」、『民博通信』133：26-27。
- 2012a 「家族・民族・国家のディスコース—社会の連続性と非連続性を作り出す仕組み」『民博通信』137：8-9。
- 2012b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中国の社会と民族——人類学的枠組みと事例研究」『民博通信』139:31。

ミシェル・フーコー（福柯）著、中村雄二郎訳

- 1970 『知の考古学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1969)』東京：河出書房新社。
- 1974 『言葉と物：人文科学の考古学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Gallimard, 1966)』渡辺一民、佐々木明訳 東京：新潮社。

中根千枝

- 1981 『社会構造の比較 アジアを中心として』東京：旺文社。
- 1987 『社会人類学：アジア諸社会の考察』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関 一敏

- 2002 「ディスクール（话语）」『文化人類学最新術語100』綾部恒雄編 東京：弘文堂 pp.120-121。

横山廣子

- 1997 「少数民族の政治とディスコース」内堀基光ほか編『岩波講座文化人類学第5巻・民族の生成と論理』東京：岩波書店 pp.165-198。

(英文)

Faure David

2007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CA.

Han Min

2012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Glocalization. *MINPAKU Anthropology Newsletter* 27: 13.

注

- 1) 在2008年10月～2012年3月期间，我们先后召开了8次学术会议。参加者包括民博的塚田诚之、横山广子、韩敏以及在日本各大学工作的井口淳子（大阪音乐大学）、何彬（首都大学东京）、川口幸大（东北大学）、高明洁（爱知大学）、泽井充生（首都大学东京）、清水拓野（关西大学）、清水享（日本大学）、谢荔（法政大学）、周星（爱知大学）、秦兆雄（神戸市外国语大学）、思沁夫（大阪大学）、高山阳子（亚细亚大学）、田村和彦（福岡大学）、中生胜美（樱美林大学）、长沼さやか（滋贺县立大学）、潘宏立（京都文教大学）、渡边欣雄（首都大学东京）。本次共同研究的成果论文集『中国社会における文化変容の諸相—グローカル化の視点から』将在2014年底由东京风响社出版。